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传承

● 赵兴罗

【摘要】 财政精神是财政工作者治国理财必须具备的精神与品格,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是治国理财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本文将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提炼为“以人为本、富国裕民、公平赋税和科学理财”,这些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核心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具有一致性,传承和弘扬传统优秀财政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讲好中国财政故事,为我国治国理财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财政精神 文化传承

中国传统财税文化意义上的财政精神,是指那些影响或激励后人治国理财的诸多人文成果,包括理财思想、理念、原则和伦理道德等,优秀财政精神是财政工作者治国理财必须具备的精神与品格。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理财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安邦治国的思想、理念、原则和伦理道德,积淀和蕴含着深厚的理财精神,这些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治国理财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本文着重梳理、总结和提炼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分析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核心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一致性,探讨其时代价值,并提出传承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路径。

一、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提炼

挖掘、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上优秀财政精神是对其传承和弘扬的前提。本文将中国历史上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提炼为“以人为本、富国裕民、公平赋税、科学理财”四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民本精神

“以人为本”也称之为“为民理财”,这一民本精神是治国理财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传统财税文化的核心和突出特色。在西方,“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是契约论,税收是纳税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在我

国则是民本思想,是作为士大夫阶层实现君臣共治的理论基础而存在。中国历史上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思想都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今人常说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由此而来。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理财家,都强调从人的本性出发,按照人文关怀的思维取向,制定理财的政策与措施。例如,管仲强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直观地指出民心向背对政权兴废的根本决定作用,这也是“以人为本”这个词汇的最早出处。当齐桓公问政于管仲“安国若何?”时,管子曰:“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诸多记载来看,管仲认为,百姓就是理财的出发点,也是理财的归宿点。

《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孔子认为,“以人为本”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论。他说:“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后的儒家思想,基本上都与孔孟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推行“平籴法”以平抑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这样“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这一政策维护了民众的利益,保证了民心不散,以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

唐代政治家陆贽根据儒家的正统观点,强调人君治国在于“明其德威”,在理财方面注重“以人为本”。他说:“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官吏要“以天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强调理财要“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以人为本,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这就要求在财政政策上做到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安富恤穷。

上述见解,不胜枚举。历史上许多政治家、理财家秉持着以人为本、为国分忧的理念治国安邦。例如,唐末杰出理财家刘晏关心百姓疾苦,主张“理财以爱民为先”,采取“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等政策,反对横征暴敛,减轻农民负担。

(二)“富国裕民”的理财目标

富国裕民就是国家的财政治理要以增加国家总体富裕为战略目标,总体富强了,其中的个体自然受到惠及,从而增加财富。例如,管仲的富国思想就很丰富,他认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藏富于民,在使人民富足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他重视促进农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农措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力求通过农业整体的繁荣促进国家财政增收,进而实现富国裕民。

孔子认为国家财政收入是源自于百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而理财不能不重视百姓。基于这一理念,在如何实现富国裕民问题上,孔子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治国理财思想。

北宋的王安石提出财政改革的目的是富

国强兵,改革总原则是“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如何理财?王安石提出了理财之道,认为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他认为理财应通过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是加重百姓的负担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基础,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开拓生财渠道,涵养税源,增加社会财富。

明代宰相邱濬把理财区分成“为民理财”和“为国理财”两个层面,认为“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他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存续发展和君主实现统治的本源和基础,政治家只有以“为民理财”为己任,使人民财物丰裕,保护税源,发展生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财政收入自然增多而富足。

(三)“公平赋税”的征税理念

1.轻徭薄赋。古代君王最常使用、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理财思想就是轻徭薄赋。《管子》中含有大量关于减轻赋税的论述,且最早提出了“取之有度,少扰人民”的征税思想。“故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即国家征税要考虑到人民的税收负担,不能损害百姓的生产能力,致使税源流失,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造成国家政权的颠覆。又如“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薄税敛,毋苟於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这些都表达了薄收租税、轻征捐赋、不苛求于民的治国理念。

儒家学派主张轻徭薄赋。孔子主张“敛从其薄”,他在回答鲁哀公的问政时,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的策略。曾子进一步提出富国裕民促进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理财思想,提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论证了轻徭薄赋使民富足,对国家政权和治理的重要性。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轻徭薄赋的思想,提出“耕者助而不税”和“什一而税”等理财思想。

《荀子》主张,实行开源节流、轻徭薄赋政策,提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这里的“源”是指百姓按照时令顺序努力耕种取得丰收并贮藏;“流”是指按照等差征收赋税,充实府库。荀子提出的“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对后世的财政治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代政治家陆贽同情民间疾苦,对赋税繁重的情況极为不满,他论述经济问题的中心就是反聚敛。他提出“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

明朝张居正对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财税思想又有了一定程度创新。他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穡。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因此,有必要实行“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通过增进商业往来、活跃商业流通来促进农业发展、促使农民富裕,进而保护和稳定税源。

2.税负公平。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主张设计更为合理和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税制,以达到保护税源的目的。为此,税制设计应该“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种蕴含公平赋税的主张,既能保证财政收入,又能涵养财源,保障了人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最终以富民足民促使国家的富强和稳定。

(四)“科学治财”的理财方略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理财家和政治家在财政预算、财政收支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取之有道、理财有方、聚才有度、用才有效”等理财方略,集中体现在遵循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结合、依制度理财、依法理财、税源管控、财政审计和监督等方面的科学理财治国方略。

1.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理财原则。一是量入为出。就是以收定支,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理财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国家预算的基石。西周之后,量入为出成为多数朝代理财思想的核心和基础。《礼记·王制》记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是量入为出财政原则在中国史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管仲进一步发挥了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提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其间,则上下相疾也”,他从自然、百姓和君主三个方面阐述了财政收支适合的重要性。

在财政收支问题上,孔子把收入和支出有机联系起来,主张崇俭抑奢,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即该节省的支出一定要节省,体现了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

唐太宗在治理国家方面,也一贯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他认为:“先王之治,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这一科学的理财原则,使唐王朝的国家治理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北宋理财家王安石也坚持量入为出,他解释了实施量入为出财政原则的原因,他说:“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

二是量出为入。在中国财政历史上,受农耕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朝代都实行了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但是到了780年,唐德宗任用杨炎施行“两税法”改革,实行了“量出以制入”的原则,即根据朝廷的需要,在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范围及规模的条件下,根据支出确定收入。

三是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受近代西方国家支出思想影响,清末著名思想家黄遵宪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国家

政治经济的需要,因而主张“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人,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即是把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在财政收入上采用量入为出,在财政支出上则主张量出为入原则。

2.节用且注重支出效益。在财政支出上,晏婴提出了“伦理的财富观”,认为个人获得或追求物质财富,要有一个社会伦理限度,犹如“布帛之有幅”一样,决不可漫无边际。他认为,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都应当“节用”。管仲主张节用,反对奢侈浪费,认为“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他认为节用的关键在于“度”(标准和制度)的把握上,他提出“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俭节则倡,淫佚则亡”,主张财物的用度要有正当说法,禁止民众铺张浪费。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向财政支出要效益的思想家。在财政支出上,他把节用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节用的同时还要讲究支出效益,提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即是说,凡是增加了支出,让百姓付出了劳动,却不能为民谋取利益者,贤明的君主都是不会做的。

荀子认为,“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这说明国家所兴办的事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所产生的效益,必须足够养活百姓。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主张治国理财要尽力做到财政支出与人民生活能力相适应,展开来说就是征税要合理节制,考虑百姓的赋税能力,保障行政机构正常运行并能维护社会秩序即可。

3.依法理财。国家善治需要依法理财,需要构建完善的制度规范。一是依据理财制度规范财政运行。财政制度是指导和制约国家财政分配活动的依据和准则。例如,《周礼》记载的“九赋之财以制九式国用”,就是以特定收入安排支

出的财政原则,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税专用思想。二是要依据法律制度管理财政。封建国家各朝代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制度,如《秦律》《汉律》《唐律》和《大明律》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重视重典治税,对财税实践中的违法官吏依法整饬,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而他主张“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朱元璋“惩贪三大案”(空印案、郭桓案、欧阳伦驸马案)就是财政历史实践中依法治税的典范。

4.加强税源的管控。荀况在《荀子·富国》中提出“节其流”“开其源”,这成为后代应当遵循的理财原则。管仲广辟渠道,开拓税源,实施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官山海”政策,在没有使民众反感的同时获取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也主张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开源就是指发展农业,他主张实行农商并重的政策,“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5.加强财政审计。治国理财离不开对财政收支环节的审核和监督,这是财政管理的重要方面。例如,管仲认为,理财要有严格的财政制度监督,以便防范财务管理风险。《管子》记载有“明法审数”的思想。“明法”即理财要有制度,“审数”就是对各项收支进行审核,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舞弊和差错,因而要重视计数方法在理财活动中的作用,并运用计数指标检查和考核财务政策的执行效果,这一理财思想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财政审计制度。

6.理财不能忽视生态环境因素。在中国传统财税思想中,不乏环境保护的财政理念。西周前期,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政府逐渐颁布禁令,规定开放山林川泽的时间和地点,即“林麓山川以时入而不禁”,还明确设立了若干机构和官吏,派官对山林川泽进行专门管理。据《周礼》记载,对山林川泽设有掌管山川政令的“少虞”“山虞”“山衡”“川衡”“井衡”和“泽衡”。西周后期,由于采捕数量的增加,政府职能扩大,为加强管理和满足财政需要,开始对山泽的产品征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山泽税,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涵。战国时期的荀子,还提出了如何保持生态

平衡,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上这些的史料,虽然很原始,但都表明先人早已注意到了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二、传统财政精神的核心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一致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特征与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核心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公共财政治理体现“以人为本”

从上述提炼的中国传统财政精神可以看出,古代著名的理财家都认同国家财富来自于百姓,国家富强取决于民力,国家强大的基础和保障是人民,因而治国理财需要以人民为根本,“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奉行的优秀财政精神之一。财税事业发展离不开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依然需要财税工作者对公共财政的治理要“以人为本”,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公共财政治理应当遵循的根本原则。

(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国富民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统一。一方面,物质文明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规模的极大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把我国建成国富民强的国家。“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正是古代理财要求的重要财政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富国裕民依然是我国必须坚持的财政理念。另一方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要求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理财、民主理财,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这也是精神文明的要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传统优秀财税精神,尤其是古代征收的山泽税,就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典型理财思想,也是保障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因而今天的财政治理,依然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国理念,建立保护环境的税收制度,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奉行开放的发展理念

传统财政精神,主张理财不应当封闭自我。例如,清后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向外看世界,总结西方先进的知识和经验为我所用。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案,初次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预算方式,先由各省区编制预算表册,上报度支部审核,最后经资政院审批的程序。预算科目在形式上已基本符合近代国家财政预算的体系,标志着中国预算方式开始向近代化、制度化的方向迈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国家治理必须奉行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实行对外开放,反对闭关锁国,扬弃式地借鉴西方的税收理论和制度,加强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传播力度,提升中华传统优秀财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

财政民主和法治财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财政民主是人民主权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指在财政立法和财政管理各项活动中应当充分体现并尊重和保护纳税人在纳税活动中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权。财政民主是国家最为基础的民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根本,是判断一个国家税收制度的优劣以及国家征税权规制程度的重要指标。财政法治强调依法理财、依法治税,通过财税法治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过程实现人民民主,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恰恰是人类传承财政民主的重要理财精神的成果,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框架。

三、传统优秀财政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创新传统

优秀财政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提升我国治国理财能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财政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思想根基

中华民族拥有在五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民族治国理财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财政精神强调的“以人为本、富国裕民、公平赋税、科学理财”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财税精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根基，因而具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还不断从中汲取历史智慧、营养和力量，为构建中国现代财政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二）传统财税文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财税思想是我国早期宝贵的文化财富，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国自身和西方各国借鉴。治国重在理财，而理财需要明确的财税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财”的支持，而理财思想是行动的向导，为治国理财提供着行动指南。在社会阶级矛盾突出的各个历史时期，优秀的治国理财理念和精神往往能够缓解矛盾，巩固政权。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时代如何更替，治国理财的优秀理念和精神一直是永恒的课题，人民对治国和理财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和期望。在新的财税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财政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从而构建新的治国理财体系，达到改善国家治理的目的。

（三）传统财政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治国理财的智慧和办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财政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例如，本文从中国财政历史发展历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以人为本、富国裕民、公平赋税、科学理财”的财政精神。财政精神与治国理财息息相关、相辅相成，财税精神赋予理财人治国理财的智慧，是治国理财的指明灯、带

路人。不管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大一统之后朝代更迭的财政改革，中国历朝历代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围绕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而制定并推行一系列财政政策和措施以稳固国家政权，指导他们进行财政改革的正是其总结历史、结合实际而进行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秀传统财政精神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财政精神还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传统财政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今天治国理财依然离不开从人的本性出发，制定财政政策。传统财政精神强调辩证思维和比较思维，强调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来认识事物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强调“取民有度，用之有止”，今天在处理财政问题时，依然要求理财人遵循轻徭薄赋，节用爱民，这正是辩证思维的具体表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财政治理提供重要的方法启迪。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传统优秀财政精神的路径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提炼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

提炼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是精神传承的前提。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优秀财政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十九大将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理念等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讲好中国财政故事，首先要了解中国财政历史，了解中华传统优秀财政精神。

财政精神是财政事业发展的灵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总结提炼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念，中国几千年的财政历史实践为我们提炼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取之有道、理财有方、聚才有度、用才有效”的科学理财治国方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以人

为本”财政理念,严谨理财,富国裕民的理财方略等,都需要我们深入研思中国财税历史变迁,深入挖掘、提炼和阐发中华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激发其对新时代治国理财的文化价值潜能,为探索构建中国风格的财税理论和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传承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优秀财政精神凝结沉淀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财政精神和文化传承在一个国家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①这说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对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影响,因而传统优秀财政精神需要得到传承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②。可以说,传承中华传统优秀财政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

(三)弘扬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

1. 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弘扬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例如,可以利用高校课堂的教学平台,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今天的青年学生都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主力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培养治国理财的人才,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引导他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坚持文化自信,使大学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财税文化的精髓和价值所在,提高其对中国财政历史的史学素养。

2. 要对财税工作者积极进行宣传和职业道德教育。例如,“清正廉洁”是对理财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精神的基本要求。财政部门承担着管理国家各项财政收支等重要职责,廉洁奉公是对财政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因此,财政部门要以构建廉洁、高效型财政为契机,加强廉政文化

教育,规范、约束和监督理财人的收支行为,建立阳光财政、廉洁财政,使理财人“清正廉洁”的财政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四)创新发展中国传统优秀财政精神

人类社会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定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制度的局限性,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财政理念产生影响,因而在中国传统财政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财政实践,扬弃式地对中国传统财政精神进行传承和创新,从而实现传统财政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项目基金:本文为湖北省教研项目“中国优秀传统财税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20221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注释:

①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23年6月30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89434.htm。

参考文献

- [1]本刊记者.提炼“财政精神”提升财政形象——财政部对开展“财政精神”提炼活动进行动员[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2,(07).
- [2]孙文学,王振宇.《周礼》的财税文化初探[A].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论文集)[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 [3]赵兴罗.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财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J].财政监督,2019,(20).
- [4]周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J].品位·经典,2023,(07).
- [5]朱香敏.增强文化自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光明日报,2023-07-27(06).